

军事与经济互动论

余爱水摇著



内容提要

军事与经济本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这对矛盾得到转化和统一,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即互动关系,是一个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曾引起过理论界的关注,前人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都分散在许多相关的论述中。在战争不断吞噬人类资源、军事需求无法大幅减少甚至还将继续增长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将军事与经济互动作为重大课题专门进行研究。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以“军事与经济互动论”为题,试图构建这一理论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总体思路。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军事学、经济学、战略学相结合的角度,从分析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入手,着眼新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伟大复兴,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战略构想、战略利益,深入展开对经济、军事、科技本质属性及其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剖析、论证,并由此产生展望性、对策性思考,从宏观上提出解决矛盾的思路、办法,即军事与经济互动的基本路径。

导摇论

摇摇一、研究的动因

善良的人们无不渴望永久和平。但在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没有消除以前,永久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之前,我们只能正视战争威胁,加强国防建设,并准备在必要时为正义事业而战。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历来是中国的立国之宝,也是从战争史的回顾中获得的血的教训。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带给国家安全的威胁依然严重存在。虽然新中国从1949年以来没有在本土进行过大规模战争,而在邻国和边境地区却多次发生战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安全威胁不断向中国逼近。在综合安全受到严重挑战的局势下,军事安全威胁日益突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中国周边形成新的军事包围圈,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诸如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频频引发军事危机。国人曾群情激昂、愤愤欲战。然而,出于战略全局和综合实力的深层考虑,中国政府均以韬光养晦、沉着应对的策略手法息事宁人,化险为夷。这充分表现了国家的理性和成熟。但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选择软化和温和的策略手法,毕竟是无奈之举,而决不是上策。因为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军事还不强大。这并不是当代人的过错,而是历史的遗憾。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文化和血缘宗族制度的影响,许多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国防观念比较淡薄,

即使到了近、现代,在几次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仍有相当多的人不问国事。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主要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力日衰,铸成了“有国无防”的屈辱历史,使得炎黄子孙无不感到切肤之痛。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过中国,致使中华民族国土沦丧、任人宰割,遗害百余年,后患至今尚未消尽。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万众一心,致力振兴国家。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曾一再失去发展的机遇,与强国、富国的差距一度拉大。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极力消除内耗带来的不利因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向前发展,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但是,如何把握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这个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一度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一些人感到已是“太平盛世”,如今可以相安无事,轻视国防的现象开始滋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少数军人放下主要职能投入汹涌的商品经济大潮之中,有的甚至以集团性质从事生产经营。这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是海湾战争和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两声炮响”,那么,人们重新觉醒恐怕还需时日。

现实是生动的课堂,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历史条件下,在局部战争、恐怖事件频频发生的国际环境中,在霸权、强权步步紧逼的形势面前,全国上下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只有暂时的经济发展、生活富裕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保证国泰民安、使好日子持久地过下去。中华民族素有尚武强军的传统,面对新的军事安全挑战,要求强军的呼声迅速高涨,在一致对外上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于是,在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地方和民间组织甚至私营企业主、普通老百姓都纷纷要出

资购买飞机、导弹,以助中国军力快速发展,以使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能够享有与大国相应的地位。民间“保钓”行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企盼祖国统一的愿望非常强烈。这是十分可贵和令人振奋的。但是,仅有一腔热情还远远不够,必须理性对待和思考国家安全这样一个命运性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切实搞清楚军事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避免单纯凭经验、靠感觉来判断决定问题的现象,使决策和实践建立在科学理论支撑和科学机制运行之上。如果不这样去做,就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永远幸福,如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一大批智者、谋士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深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理念,从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从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和新军事革命的大趋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大目标出发,积极研究探索出新的理论成果,为国家战略、军事战略、经济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推动军事与经济共同协调发展;引导国民懂得“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深刻道理,形成全社会人人支持和参与国防建设的局面。我的导师许毅^①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典范,虽然他已是 85 岁的高龄,但从未停止过对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探索,形成了一套颇具高见卓识的理论体系,成为了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许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列入世界强国之林,是以科学技术尤其是军工科技能否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为标志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上的强弱是以国民经济的强弱为基础的。国民经济的强弱是以科学技术的领先程度为基础的。而科学技术的领先程度则以军工科技的领先为标志。因此,军工科技是国民经济强弱的测量器。所以,马克思称暴力即经济力。国防军备的先进与否,就成

^① 许毅,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教授,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历史学家。

为国民经济强弱的衡量标准。这就是国防战略同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依据。”这一重要思想是许老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他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分析问题,得出客观、全面、公正的看法与结论。正是在许老的深刻影响下,笔者选择了“军事与经济互动论”作为学习研究的课题。

二、研究的依据

一是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历来重视研究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自古就有关于“富国强兵”、“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的思想,关于“军旅征伐,非财不给”、“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军无蓄积则必有后患”的思想;关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思想,关于“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的思想;关于既“重战”又“慎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战而胜”的思想等等。国外著名军事家、经济学家也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于“国防比富裕更重要”、“国家是人民的守护人”,公共财政对于军事支出是“国家的首要义务”的思想;关于金钱积累是战争的中枢神经和主要支柱,国家军事威力的根源是生产,解决战争财政问题依靠税收,战费的筹措必须以供求平衡的思想;关于军费支出收不回的思想;在持久和平到来之前,军费开支是必要的思想;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增加军费开支是刺激有效需求、帮助经济走出萧条困境的手段之一的思想;关于现代战争是总体性战争的思想;关于热核战争的突然性和巨大破坏性不会给我们经济动员的时间,必须把战时经济置于平时经济之中,即平时经济战时化的思想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以战争与经济的矛盾关系理论为基础,科学地揭示了战争与经济、军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力

量和经济制度对于战争暴力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暴力根源于经济的科学论断,第一次系统揭示了战争暴力以经济为本原和基础的基本原理,不仅阐明了经济对暴力的决定作用,还指出了暴力对经济的反作用。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期的新特点,认为现代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必须动员全国的物质资源,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还较早地提出了军事经济效益问题。斯大林则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的“扬军抑民”的思想。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结合起来,继承古今中外的优秀军事理论遗产,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军事经济思想。他认为,国防与经济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提出必须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论断,提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领导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定位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明确强调国防建设要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主张军队“吃皇粮”,提出科技强军,实现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军队历史使命等战略思想和治国治军新理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军事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人类科学地研究和解决军事、战争与经济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新军事革命必将带来战争和军事理论的重大突破。新世纪,军事领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研究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层出不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军事与经济关系

的论述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的态度和创造精神研究军事与经济关系问题,才能揭示并把握其规律,保证其正确方向。对于军事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存在着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很大区别,但它们之间也有相通之处。这主要是因为,在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中,军事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共同的属性。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有的虽然带有其历史局限性和认识的偏颇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那些富有相当的科学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要一概否定。因此,我们研究军事与经济关系问题,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可借鉴其他各方面有关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军事与经济互动问题的研究具有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支撑,更具科学性、权威性和说服力。

二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的新变化。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摩擦、协调、磋商、合作、共处的新时期。今后较长时期内,世界的基本态势仍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但是,人类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极力打造与其战略匹配的武装力量,追求绝对军事优势。世界军备竞争进一步升温,主要表现在高额的军费投入、太空武器的研制、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核扩散以及新型智能武器的研制等方面。超级大国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为了不断扩展本国利益、巩固霸主地位,任意对别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武装肢解。事实说明,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单纯的军事,也没有单纯的经济,军事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这

就从当代世界发展变化规律和特点上为军事与经济互动研究提供了依据。

三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与冷战时期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强大的军事压力相比,目前中国周边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外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较小,因周边热点问题而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从冷战结束至本世纪前 20 年,是中国集中精力谋求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 世纪末,中国人民终于圆了小康生活之梦,这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事,它实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跨越。2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还是第一次站在了崛起的起点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抓住 21 世纪头 20 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有巩固的国防作保障。一个国家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的,也难以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甚至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受制于人。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建设应坚持目标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相一致,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相协调,充分考虑:祖国统一和周边环境方面的军事安全问题,世界军事革命中各国军事力量的剧烈变动给中国国家安全的动态压力,以及中国在全球范围的战略利益拓展对国防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根据这几个重要因素,准确把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到 21 世纪中叶即建国 100 周年时,国防也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军事实力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使军事成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捍卫者,能够粉碎任何可能打断本国发展进程的威胁力量。

没有军事理论的创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依据

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站在世界高地,结合本国实际,考察军事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加强前瞻性研究,更好地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揭示并遵循军事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特殊规律,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研究的对象

军事与经济互动论是研究军事与经济特殊矛盾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互动论研究的对象则是军事与经济以及它们内部各部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其任务是揭示在特定历史(战争依然存在)条件下军事与经济互动过程中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作为矛盾着的两方面的军事与经济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驱动的关系。经济是本源和基础,它既是战争的根源,又是军事的物质基础;军事对经济起制约、驱动作用,它既可以为经济提供安全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又会占用大量资源,甚至制约经济发展。这种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制约和驱动作用的关系,构成军事与经济互动的关系,构成军事与经济互动的关系,构成军事与经济互动的关系。

资源在军事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数量分配关系,决定着经济规模与军事规模的问题。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在军事与经济领域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是互动论研究的关键问题。军事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共同的负面影响。因此,军事规模问题就成为研究军事与经济矛盾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合理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节约资源。军事资源的消耗和占用与军事效益并不完全一致,有时消耗和占用很多但效益并不大,这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里主要是一个军事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益问题。提高军事效益,意味着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由于军事的特殊性,军事效益与

经济效益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军事效益的评估又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方法来计算,必须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综合起来考量。这些都是军事与经济互动论要研究回答的问题。

概而言之,军事与经济互动论是研究合理配置、充分利用资源以谋取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综合利益最大化(共赢)的科学。

四、研究的内容

军事与经济两种社会现象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赋予了军事与经济互动论以广阔的研究空间,使军事与经济互动论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三篇、八章。

导论,包括军事与经济互动论研究的动因、依据、对象、内容、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第一篇(第一至第二章),军事与经济互动背景。在战争没有消亡、国家安全始终面临威胁的历史条件下,军事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是一种特殊矛盾。这种战争危险和特殊矛盾的存在,便是军事与经济互动的特定时代背景。军事与经济互动论则是依据这一背景而提出的。

第一章,军事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巨大的军事需求与有限的经济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军事与经济相互依存、相驱发展的基本矛盾状态。深入分析军事需求与供给矛盾的产生及其特殊性,以及信息化战争对军事供需带来的制约和影响,揭示军事供需矛盾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是进行军事与经济互动问题研究的首要任务和重要基础。

第二章,新的战争威胁。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战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但就某些国家或某些地区而言是有和平时期的。而所谓和平时期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

过去人们往往用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来判断国家的安全度,而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的形态和样式早已发生变化,人们经验中的世界大战再也不会发生了。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方式和标尺判断形势,以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就是和平的、安全的,那将会与现实状况及发展趋势相差甚远。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不打世界大战并不等于国家就没有遭受战争的危险,相反地,面临的战争威胁更经常,甚至危害更严重。

对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可以作出这样一种新的解读:局部战争频频发生,恐怖战争防不胜防,隐形战争悄悄降临。战争魔鬼几乎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拖向了危险的边缘,谁也无法置身其外。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世界。而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的演变又必然会使军事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篇(第三至第五章),军事与经济互动要素。经济是军事的基础,经济对军事起决定作用;军事对经济具有制约和驱动双重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是第一军事力,从而成为军事与经济互动的纽带。经济、军事、科技三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是军事与经济互动的三要素。

第三章,经济对军事的决定作用。分析军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首先要从战争与经济关系入手。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则表现为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

战争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观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战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信息化战争虽然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和作战样式,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的经济实质。信息化战争既是政治的继续和最高形式,也是经济的延伸和最高竞争。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升综合国力,这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

也是扼制战争爆发、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第四章 军事对经济的双重作用。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对立的、矛盾的,同时,又是可以和谐统一的。

军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军事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战争与和平不断交替出现。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平时期,军事活动总是在持续进行,并且始终以战争为中心。军事对于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它可以产生两种巨大作用:或者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独立、领土完整、安全统一和稳定发展,或者相反。军事对经济这种积极与消极共存的双重特性和作用,给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人类没有战争或消灭战争状态下,军事是对经济的纯消耗和完全扣除。而当今人们所处的并不是这样一种理想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在有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军事与经济对国家而言,往往成了天然的伙伴,可以向着良性互动的方向相依为命,相伴而生。从起源的角度考察,经济从根本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从现实的历史阶段而言,两者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可以讲,经济不发展,就没有财力发展军事;同时,也可以讲,军事不但制约经济,而且驱动经济,甚至决定经济。一国由于军事上的衰弱不能抵御侵略,国家的安全都保不住,深陷战乱和破败的苦难深渊之中,还谈得上发展经济吗?经济决定军事,军事对经济起制约和驱动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军事与经济关系理解为谁重谁轻、谁先谁后,而应当把两者紧紧捆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观点。

第五章 科学技术的纽带作用。科技革命的事实使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作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结论得到最新验证。基于

此,邓小平在 1988 年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毅然决策中国搞“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一举打破了少数国家的核垄断,对于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以,才有尼克松、田中访华和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中美、中日建交,也才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加入 WTO,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军事力、第一战斗力。世界发展史表明,绝大多数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首先总是产生和被应用于军事领域。这是因为,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得失之争、共存之争,而军事领域的竞争是极限竞争、生死之争。因而,竞争主体各方必然要竭尽一切努力,首先在军事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上展开殊死争夺搏斗,以抢占制高点,获取科技优势,从而掌握整个战略主动权,并由此掌控、驾驭各种局面。

科学技术是军事与经济互动的核心和纽带。无论发展经济还是发展军事,都必须借助这一强大的推动力。科学技术具有令人无法估量的创造力、驱动力。当今世界,国际间的激烈竞争,集中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争夺科技高地。因而,以综合国力为支撑的信息化战争,必将使科技领域成为“第一战场”。战争首先从这里打响,决战在这里展开,胜败由这里决定。预测、判断一国是否对别国军事安全构成威胁和是否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胜,关键是看该国对科学技术的掌握程度、发展水平及其如何利用,是否实现了科技与军事、经济的互动。谁在科学技术上占据优势,谁就会在军事上占据强势,并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占据有利态势,取得综合国力比较优势。这是其或称霸世界或主导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客

观规律。

第三篇(第六至第八章),军事与经济互动路径。主要研究如何在实际运作上,科学谋划和确立军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使军事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平衡、相互促进,达到一个最佳相容度,形成一种纽合力、同驱力、倍增力,共同推动国家机器沿着高速轨道平稳持续向前运行。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战略和宏观上考虑,主要有三条路径,即和平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

第六章 和平发展——创造高度稳定的建设与投资环境。和平是发展军事的目的,也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能不能争取和平,是对军事与经济互动的最根本检验。通过互动赢得和平,利用和平促进发展。要想抓住 21 世纪前 10 年的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亦即和平崛起。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自己创造。因此,要探索维护、巩固与发展和平的途径、手段和方法。一是运用新型安全机制维护和平;二是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三是运用军控和裁军维护和平;四是运用危机管理维护和平;五是在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中维护和平。

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总体安全战略环境。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可以带给中国所需要的重要的外部市场、资金、技术、信息来源、管理经验,等等。可以以此为契机改善周边战略态势,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同时,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将决定中国用什么方式维护统一和国家安全。目前看,中美之间的利益共同点不会消弭两国利益的根本对立,也不会改变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本质。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冲突在未来 10 年也不会构成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要看到,在战略机遇期内,中国国家安全的面临的主要威胁将来自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始终面临美国军事干预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关键是必须着眼大局,对一些局部问题